

近世文化论丛

中国近三百年 疑古思潮研究

路新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序

“疑古”这个词是由动词“怀疑”和名词“古史”复合而成的一个词，它的意思应当是指对古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这种怀疑，落实于治学，往往以“辨伪”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以内，我们可以说，“疑古”也就是“辨伪”。又因为怀疑的对象——“古史”实包含着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和古史本身两个方面，因此，“疑古”或者说“辨伪”一词也就包含了对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的真实性的怀疑和对古史本身的真实性的怀疑这两方面的内容。

疑古思想之在中国，其悠远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先秦时代。所谓疑古“思想”，是指那些“零星”出现，尚不成“规模”的对于古史真实性表示怀疑的思想。《论语·子张》中子贡发出的“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感叹；《孟子·尽心下》中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的提示；《韩非子·显学》中的“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矣！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的论述，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疑古思想的表述。这其中不仅有如孟子的对记录史

事的典籍的怀疑,而且也有如子张、韩非的对史实本身的怀疑。

在我国,疑古思想的出现虽然甚早,但疑古思想形成为思潮,出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那种因“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的现象,那还是近三百年间发生的事。在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史上,疑古思潮出现过三次:明清之交一次,清初一次,“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在这三百年间,时代的鬼斧神工开凿了一条坎坷不平,地貌独特的历史河床,先前的疑古思想的涓涓溪流在这里汇集了,涌动了,澎湃汹涌为疑古思潮的滔滔大河。它奔腾着,跳跃着,咆哮着,歌唱着,它曾经那样富有生命力地一往无前地行进过,并曾经对它所流经的那一段岁月的社会现实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当疑古思潮的历史潮音已经平息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人们仍然会发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这说明,疑古思潮已经把它的风貌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记忆的底片之上,将它的精神融入了我们民族的品格之中。今天,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首往事,当我们站在疑古思潮的河床下游向它的上游眺望,油然而生的敬畏感使我们战栗,赞叹,也使我们朝乾夕惕,陷入沉思——对业已逝去了的祖辈先贤们所创造的历史遗迹折腰赞颂,一咏三叹,这是每一位史学工作者所必然流露的真实情怀与职业习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因此,对中国近三百年间曾经出现过的疑古思潮进行系统的总结,其意义与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国近三百年间的疑古思潮发展史上,一直到“五四”以前,疑古思潮的历史创造虽然精彩纷呈,但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的历史总结却显得平淡而薄弱。在这期间,明清之交的阎若璩、陈确、胡渭,清代早期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晚清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崔适等,他们都曾在疑

古辨伪学上有过大贡献,但他们的著述,都还只能算是疑古的著述而不是对疑古思想的总结。与清代乾嘉间的崔述相前后的另一位疑古大家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和崔述的《考信录》,对疑古的方法和疑古学发展史上某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曾经进行过片断的总结。但以内容所占的分量与比重而言,严格地说起来,这些也都还只能算是疑古的著述而不是对疑古思想的总结。

“五四”以前,既然对疑古思想的总结都还谈不上,那也就更不用说对疑古思潮进行总结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历史是需要“远眺”而不能“近观”的。那种能够产生“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历史美感的必要条件是历史观察的距离感。只有当疑古思想形成一种思想界的“群体趋势”而发皇成为疑古思潮,并且这股思潮已经行进过了一段历史的河道,它本身,或者说它的一部分已经凝固成为“历史”,只有到了这时,才能够对历史进行眺望,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总结。在这里,时间所拉开的空间上的距离感,使得历史的总结不会因为时间太短,距离过近而出现观察上的“死角”或“盲点”。

“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疑古思潮就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勃然而起,成为带有制约着思想界总体走向的一种社会思潮。所以,以对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程度而言,在疑古思潮发展史上,又以“五四”前后即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一次疑古思潮的涌动为最大最深。到了这时,疑古思潮本身已经经历了二百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时间既已足够的长,后辈们所掌握的历史资源既已足够富有,当时又正处在疑古思潮如火如荼地行进着的当口,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服务于现实。只有到了这时,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历史的总结才有可能,也只有到了这时,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

4 总结的可能性才成为现实性。

■ 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

“五四”以后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的总结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搜集、整理历史上有关疑古思想和思潮的史料;二是撰写关于疑古思想和思潮的“史”的著述。

顾颉刚先生既是“古史辨派”疑古运动的主将,又是对疑古思想乃至疑古思潮进行历史总结的先驱。1920年顾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这年冬天,他开始校点胡适让他整理的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顾先生又是最早想到要写一部“辨伪学史”的学者之一。因想要做辨伪学史,顾先生因此又想到首先应当做一部《辨伪丛刊》,将历史上有关疑古的史料搜集起来,以十万字为一集。顾先生最初拟收入的历史上的辨伪著述就有五十种。从1921年起,顾先生开始陆续标点宋濂的《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伪》。这时,顾先生将自己整理《辨伪丛刊》的想法写信与胡适、钱玄同进行了反复的探讨。胡适、钱玄同在给顾先生的回信中不仅对顾先生给予全力的支持,而且对如何编辑《辨伪丛刊》,包括《丛刊》的体例、内容、时限,“伪史”和“伪书”的分别等等发表了很详尽的重要意见。可以说,顾先生搜集辨伪学史料的工作,是与胡适、钱玄同的支持、鼓励分不开的。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到1935年《崔东壁遗书》的问世,这期间学术界曾经掀起过一阵“崔述热”。1921年,受胡适的嘱托,顾颉刚决定标点崔述的《考信录》,整理《崔东壁遗书》。在整理《遗书》的过程中,1923年,胡适辑集了《大名县水道考》等崔述的佚文;1928年,顾颉刚在居粤期间得到崔述夫人的《二余集》;为了尽可能全面搜集有关崔述的史料,1931年,顾颉刚、洪迈亲往崔述故里大名县访问,并作《崔述故里访问记》;1932年,洪迈从燕京大学图书馆中得到崔述的《知非集》;1934年,顾颉刚从友人处得到崔述弟崔迈的佚文共七卷综七万言。以上这些新搜集的史料,最后全部被辑集到了《崔东壁遗书》中,使《崔东

壁遗书》成为有关崔述史料的一个最完备的本子。

新文化运动中的疑古先驱所搜集的史料,其完备、周密、系统的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可比拟的。我们今天能够顺利地进行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研究,主要依靠的,还是“五四”以后的疑古先驱们为我们准备的现成的史料。这个筚路蓝缕之功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

关于撰写有关疑古思想和思潮“史”的著述,约略又可以分为两端:一是对某些具有疑古思想学者的个案研究;二是对疑古思想和疑古思潮发展的历史作通贯的叙述。

从对某些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的个案研究来看,胡适写于1925年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是一部有影响的著述。1922年顾颉刚先生作《郑樵传》,对郑樵的疑古思想颇多发覆。

梁启超、钱穆分别写于1926年与1931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有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仅有的两部同名专著。这两部专著并行于世,独步一时,为时人目为“双璧”。梁任公先生的书以清儒对晚明学风的“反动”为切入点,横破诸家,娓娓道来,有截断众流之势;钱宾四先生则以理学在清代的延续为突破口,述学理的内在衍化,如剥茧抽丝,一线相悬,其内在理路历历可循。我的这部书,受两位先生的恩泽不浅。任公、宾四先生的两部专著,对明清两代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如阎若璩、陈确、胡渭、崔述、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廖平等人治学的论述,尤其是我反复阅读与揣摩的。以我的私愿,倘若两位先生能够凭借他们的如炬之目,如椽之笔,依着两位先生的深厚学养,为我们留下一部《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那将是学界何等的幸事!惜乎两位先生未能瞩目于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通贯研究,在他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上述具有疑古思想的学者的论述,亦仍然局限于“个案”而未能形成一部“疑古史”。

在“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中,他们对疑古思想和疑古思潮作

通贯研究的著述也不多。1926年曹养吾先生写了一篇七万言的《辨伪学史》(收入《古史辨》第二册),对疑古思想作了一次成系统的总结。1935年,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史学年报》上发表了《战国秦汉间的造伪与辨伪》一文,在此文的“附言”中,顾先生说:“去年春夏间,逼着自己作一篇序文,要把二三千年来造伪和辨伪的两种对抗的势力作一度的鸟瞰。”这说明,顾先生原是有志于作一部辨伪学史的。可惜顾先生此文只论及先秦以迄于秦汉间的疑古思想的发展,秦汉以下的部分尚付阙如。直到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重新出版《崔东壁遗书》,顾先生始增写了秦汉以下的部分,且与原先写就的先秦以迄于秦汉的部分合并,作为《崔东壁遗书》的《序言》。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疑古思潮渐趋消歇。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学术界治学的视角,几乎很少对准过疑古思潮的研究这一学术领域。近年来,学术界有了一些有关疑古思想的研究,或者说与疑古思想的研究多少有一点关系的译著、专著或论文。例如,1995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庆的《公羊学引论》,1997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赵刚翻译的美国学者艾尔曼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对清代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想有所涉及。但这几部书从政治方面用力较多,在学理方面着墨较少,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将疑古思潮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邵东方的《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该书对崔述的研究着力甚勤,但这是“个案”的研究而非疑古学的“发展史”。此外,吕思勉《论学集林》中的《读崔东壁遗书》^①,刘起钊的《古史续辨》^②,徐

①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旭生的《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①,李学勤的《李学勤集》^②中的有关篇目等等,对于疑古思想的发展均有深刻的论述。与内地相比,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学术界对疑古思想的研究起步略早,成绩也要大一些。例如,施耐德(Schneider, Lauence A)(梅寅生译)《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③,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④,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下。见其中卷三“方法学派”中的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古终于信”) ^⑤,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⑥,林庆彰《清初的群经辨伪学》^⑦,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⑧,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⑨等一批专著,对于中国近代的疑古特别是“五四”以后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以及顾颉刚、胡适等大家的疑古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王健文《一个寂寞的史学家——典范变迁中的崔述》^⑩,陈祖武《古史辨的先驱——崔述》^⑪,杜维运《民国史学与西方史学》^⑫等一批论文也述及了崔述的疑古思想和清代疑古思潮中的某些问题。然而,就总体来看,这些论著,对于近三百年以来疑古思潮“史”的发展所作的梳理仍然是片段的。而且,将疑古思潮置诸于学术史的

① 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 年版。

⑤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⑥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1987 年版。

⑦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0 年版。

⑧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⑨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8 年版。

⑩ 《历史学报(成大)》(18)台南,1992 年 12 月,第 153—172 页。

⑪ 《历史月刊》,(111)1997 年 4 月,第 114—117 页。

⑫ 收入《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台北,1985 年)

大背景下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论著也还有不尽如人意处。要之,综观近年以来的内地与港台学术界,对于近三百年以来疑古思潮的发展作通贯研究的著作仍告阙如。而如前所述,对近三百年以来疑古思潮的发生与发展作历史的总结,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有鉴于此,我把“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作为本书的专攻方向,正是想赓续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几乎中断、而至今仍显薄弱的疑古思潮“史”的研究的传统,希望为这一学术领域的繁荣贡献一点点绵薄之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以及近年来学术界所取得的疑古思潮研究的成果,基本上是我今天进行“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课题的基础和起点。在充分享受祖辈先贤留给我们的历史资源时,对于先贤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中所付出的辛劳与所取得的成就,我要表达的谢意与敬意是由衷而深切的。但与此同时,对于先贤们的研究成果我也还有些许感到不尽履足的心情。因此,我在这部书稿中试图在如下四个方面有所增益或者说有所突破:

首先自然是对于时限的不满足。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纵横捭阖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舞台上的疑古学者们,他们正忙于“创造历史”,对于他们亲身参与,亲手创造的那一段疑古思潮的历史,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加以总结,而在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发展史上,这一段历史又恰恰是最为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时段内的疑古离现实最近,因而对现实的影响最强烈,而且因为这一时段内的疑古,它直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内的重要性,决定了疑古思潮的研究在我将要涉及的学术范围内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在书稿中对这一段疑古思潮的历史运动进行总结,并以此为本书稿研究的重点,这是“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课题的应有之义。

其次是对个案研究的补充。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派是疑古思潮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这样一些清代早期公羊学家,一直到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这样一批晚清今文经学家,把他们放在“疑古”的学术范围中作个案的研究,并进行一番探源的梳理,这是我在书稿中试图实现,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疑古学者的研究所阙如的。在清代今文经学的个案研究中,对清代今文家的治学方法论加以剖析无疑又是最为重要的。“春秋重义不重事”,这是清代今文家奉若圭臬的方法论骨干。这里的“义”是指“微言大义”,这里的“事”也就是“史”。重“义”不重“事”也就是重“论”轻“史”。“春秋重义不重事”这一古老的《公羊》义法虽然起自汉代,但对这一义法进行方法论上的具体而微的阐发,并将其全面运用于治学,运用于疑“古”(文经),那还是清代今文家,那还是康有为等人。庄存与首先祭起这一湮坠近二千年的今文义法,刘逢禄对此复进行了“文予而实不予”,“实予而文不予”的强调,即认为根据治学主体的自我判断与选择,可以并且应当对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判而不必顾及史实的真相。这样,清代今文家治学中“史”的意义就大大淡化了。至康有为,他对“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春秋在义不在事”的一字之改,遂将“事”也就是“史”从治学中彻底剔除,从而为臆断史实、附会经说,以学术议政干政找到了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据。清代,特别是晚清的今文家,对他们的治学进行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的二分评价,我认为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

第三是学理的建立。学术思想的运动、发展和变化,有它自己的一个“自在”的生命。也就是说,学术思想是沿着它固有的生命轨迹运动、发展与变化的,是受制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而“学理”,正是学术思想的自在生命与内在规律的灵魂。我认为,只有从学理着手去探求学术思想的运动、发展与变化,才能

够真正进入它的堂奥,也才能够扪及学术思想跳动的命脉。举例来说,我注意到,从晚明开始,一直到乾嘉年间的近一百五十年中,弃“虚”蹈“实”是学风的一个总体发展趋势。这种学风的形成,滥觞于东林士子对理学的清算运动,这一运动在明亡清兴以后的清朝初年达到了高峰,乾嘉诸老即沿此清初余波而起形成了乾嘉考据学。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辟“二氏”(佛、老)——尤其是清除孱杂于理学中的佛教的“形上”思辨之学,又是学术界最初进行理学清算的“把柄”与津筏,由此形成了从晚明一直延续到乾嘉年间的对形上思辨学风的厌恶和摒弃。然而,从“致用”——更准确地说是“资治”,即学术服务于政治——的角度看,恰恰是理学,对于纲常名教与现存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曾经进行过最严密的理论阐述。在社会制度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前,理学的生命力还不会枯竭。因此,即便是处在理学清算浪潮之中的清朝初年,在究竟应当如何对待理学的问题上,学术界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已埋下了日后汉宋之争和汉宋兼采的端苗。从清初逶迤而下至于乾嘉,汉宋兼采之风潜滋暗长,始终不歇。清代的今文经学即在这一学术的内在矛盾与运动的背景下悄然而起,在湮坠近二千年后终于死灰复燃。基于这样一种视角,我对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考察,即是以理学清算为入手处,而又以对辟“二氏”的学术追踪为切入点进行的。对汉学与宋学二者相互之间关系问题的透视也始终交织于这一学术考察的过程之中。总之,环绕着学理内部的矛盾运动而次第展开学术思想的生命轨迹,这是我努力遵循的一条原则。

第四是观点的“纠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疑古运动,在全面清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反封建”的那一层重要的社会使命是学者层始终肩负着的。在反封建的社会需要的制约下,“打倒孔家店”虽然是势所必然的社会趋向,但疑古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偏激观点和口号,却也

是我们今天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指正的。例如,主张“把线装书丢进茅厕里去”,甚至要求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等等,都是这种偏激观点的体现。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疑古运动中又有“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以及时人所批评的“默证法”等等。“科学”的口号,当它负荷起某些它无法承载的社会重任时,它往往会变成一种政治运动的工具,而渐次失却它的实事求是的本体精神。在时过境迁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对疑古运动中出现的这些过激观点予以“纠偏”,这也是本书稿的应有之义。

十五载之劳,一旦书稿杀青,“恂恂而未能出辞,惴惴兮怵惕。”我真诚地期待着方家的指教与点拨。

新生自识

1999年6月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理学清算与清初疑古思潮	(1)
第一节 援佛入儒与理学兴衰	(2)
第二节 辟“二氏”与弃虚蹈实：清初理学清算之 学术路径	(27)
第三节 陈确与《大学辨》	(31)
第四节 《伪古文尚书》的考辨与阎若璩的 《尚书古文疏证》	(45)
第五节 《易》学图书派批判及胡渭的《易图明辨》	(60)
第二章 乾嘉年间今文经学派疑古思潮的伏流与积累	(77)
第一节 崇汉信汉与汉宋兼采：乾嘉考据学风的 定型与嬗变	(78)
第二节 庄存与的治学与清代今文经学之兴起	(98)
第三节 刘逢禄的今文疑古学	(123)
第四节 宋翔凤学论	(189)
第三章 中国古典疑古思潮之集大成者——崔述	(218)
第一节 崔述的生平和学风	(219)

第二节	崔述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	(249)
第三节	崔述考信辨伪的成功与不足·····	(285)
第四章	中国近代史上的疑古思潮·····	(318)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中国近代学风的演变·····	(319)
第二节	论龚自珍学风·····	(369)
第三节	论魏源学风·····	(402)
第四节	廖平《今古学考》经学思想体系中的 几个问题·····	(441)
第五节	康有为学论·····	(468)
第五章	现代疑古思潮的涌动与发展·····	(495)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与现代疑古思潮·····	(496)
第二节	胡适辨伪学甄别·····	(506)
第三节	顾颉刚的疑古学·····	(535)
第四节	关于新文化运动和“古史辨派”疑古 运动的几点思考·····	(565)
参考书目	·····	(589)
后 记	·····	(593)

第一章 理学清算与清初疑古思潮

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的最初涌动,它的学术动力来自于晚明东林士子出于“资治”之需而进行的理学清算亦即理学的自我批判运动。理学援“二氏”(佛、道)入儒,将佛、道的具有宇宙本体论色彩和万物化生论本质的形上思辨之学与传统儒学纲常名教的形下践履之用相杂糅,遂将儒学的思想体系形而上学化了。从朱熹到王阳明,理学内部的发展存在着一条对“理”、“气”、“道”、“器”、“心”、“性”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探讨的愈推愈密、愈进愈精、愈攻愈巧的运动轨迹,这可以视为理学的一种学术本体化倾向。这种倾向,超出了传统治学目的论所划定的学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藩篱,因而东林士子由辟二氏入手,主张尊孔读经,弃形上而取形下,崇尚实学、实证、实践。理学的运动趋势,至此发生了重大的折捩而走上弃“虚”蹈“实”之路。本章所希望描述的正是理学内部上述矛盾运动的概貌,并期待以此厘清疑古思潮最初涌动的学术背景及其诸方面的表现与影响。

第一节 援佛入儒与理学兴衰

一、儒学为体，佛氏为用：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治学倾向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政治分裂局面的结束，初成于隋而巩固于唐。大唐在建立起一统帝国的同时，也终结了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分裂，完成了儒释道三家自身的统一。唐初，太宗命颜师古选“五经”定本，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儒学结束了北学重训诂，南学重玄谈义理的局面，使儒学走上了经典化、规范化、定型化的路径；佛学的北方重禅定，南方重义理的局面，至唐代也告结束；开元年间道藏目录《三洞琼纲》的编成，标志着统一道教的形成。

然而，学术思想的发展运动有如潮汐起落，永无止境。官方钦定儒学的规范化，隐示着儒学本身的僵化——僵化则潜伏着突破；儒归儒，释归释，道归道，原先的南学北学之争，到了唐代一变而为儒释道三家之争——斗争则孕育着整合与新生。到了唐中叶以后，僵化了的儒学已经日益失却活力，而儒释道三家之争则无宁日。改造儒学，同时吸收释老之所长——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历史运动，从唐中叶起终于开始了。拉开这个历史运动序幕的代表人物便是韩愈。

韩愈字退之，历来被视为“辟佛”的开山与健将，他的《道统论》则被视为辟佛的宣言书。然而，陈寅恪先生却看出了韩愈在辟佛的同时对佛氏的袭用，陈先生并以韩愈为理学的先驱。陈先生有一篇《论韩愈》，专门谈这个问题，他说：“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